

人文
学术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

谢天振 王 宁 主编

许 钧 著

从翻译出发

——翻译与翻译研究

Translating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復旦大學出版社



从翻译出发 ——翻译与翻译研究

许 钧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翻译出发——翻译与翻译研究/许钧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6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10594-0

I. 从… II. 许… III. 翻译学-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6923号



从翻译出发——翻译与翻译研究
许钧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7.5 字数 216千
201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0594-0/H·2333
定价:4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

谢天振 王 宁 主编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总序

中国的翻译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历史上长达千年的佛经翻译不仅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佛经翻译家,同时也催生了我国古代的翻译研究和相应的翻译思想。这些翻译思想,从三国时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到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六朝鸠摩罗什的“依实出华”,到唐代玄奘的“五不翻”,尽管多属片言只语,零篇残什,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翻译思想弥足珍贵,仍然可以为当今的译学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像唐代贾公彦关于翻译的定义“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即使从今天的译学高度看,也堪称经典。

自从严复于 1898 年提出了“信达雅”三字以后,这三个字对我国的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差不多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的翻译研究,或是讨论怎样翻译才能做到“信达雅”,或是以“信达雅”三字为标准去评判已有的翻译作品,或是探讨“信达雅”的内涵和外延,等等,几乎到了言必称“信达雅”的地步。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傅雷提出了“神似”说,钱锺书提出了“化境”说,但其思想实质,严格而言,与“信达雅”说其实并无二致,孜孜以求的也就是要解决一个“怎么译”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同样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译学界却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变化:以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为代表的一群学者站在语言学立场上,运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视角切入翻译研究,提出了“功能对等”、“交际翻译”、“语义翻译”等概念,刷新了两千年来的西方翻译研究的面貌,实现了西方翻译研究的第一个根本性的突破。

与西方相比,中国当代翻译研究的根本性转变,也即从传统译

论进入现代译论,具体而言,也即从仅仅关注“怎么译”的问题拓展到还要关注“何为译”、“译为何”等问题,时间上要晚一些,其起点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国外语院系的师生和专家学者第一次有机会走出国门,赴美英等西方国家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深入访问、进修学习,其中对翻译研究感兴趣的专家学者首先接触到了以奈达为代表的西方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并在国内的学术期刊、大学学报上撰文评说,把他们了解到的信息传递给国内同行。这些文章部分结集成《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①于1983年出版,并与翌年编译出版的《奈达论翻译》^②一起,第一次比较多地介绍了外国、主要是西方以及苏联的当代翻译理论,从而为国内的翻译研究吹进了一股新风。之后,随着《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③、《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④、《翻译与后现代性》^⑤、《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⑥等编译著述的出版,更进一步推动并扩大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与此同时,从21世纪初开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这南北两家外语出版社先后分别引进出版了数十种当代国外翻译理论著作的英文原版本,让中国读者可以直接面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英文原著,其产生的影响同样不能小觑。

①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选编:《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

② 谭载喜:《奈达论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

③ 许钧主编:《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共收入四本,分别为《当代美国翻译理论》(郭建中编著)、《苏联翻译理论》(蔡毅、段京华编著)、《当代法国翻译理论》(许钧等编著)、《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廖七一编著),湖北教育出版社,分别于2000年、2001年出版。

④ 廖七一编著:《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0年。

⑤ 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⑥ 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共收入八大译学流派33篇译学论文译文,均配以导读文章,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代的翻译研究也开始发生变化,并朝着实现其根本性转变的方向而发展。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翻译学学科意识的觉醒上。在此之前,尽管中国的翻译活动也称得上丰富多样,译者和译作的数量更是堪称世界之最,中国的高等院校里也都开设了翻译课程,但相当多的人包括高校的一些教师和学生对于翻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却不甚了了。不少人依然错误地认为,翻译不过就是把别人的东西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实践性技能,缺乏自身的原创性,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们看不到原本在一个有限的语言环境中产生有限影响的“原创性”著述通过翻译在另一个语境里得到的更大的传播和接受,甚至产生的更巨大的影响。他们更看不到最近几十年来,翻译本身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越来越得到来自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视角的关注和考察。翻译研究借助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阐释学、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已经突破了语言中心主义的狭隘模式,而成为广义的文化研究平台下的一个分支学科领域。翻译研究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研究学者,甚至包括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注目光。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学界的共识。与之相应,在中国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翻译学的大讨论后,终于在21世纪之初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得到了体制内的承认:目前已有159所高校建立了翻译硕士专业(MTI),另有一百余所高校建立了独立的本科层面的翻译系。此外,多所高校还都招收翻译学的博士生。

其次,体现在翻译研究理论意识的觉醒和跨文化研究视角的应用上。在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的翻译研究多围绕文学翻译展开,而在文学翻译界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翻译是一门艺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再创造性质的艺术,于是翻译理论也就被定位在建基于这样一种艺术实践中获取的经验之上,并反过来要求其能够指导翻译实践。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翻译研究,大

多是围绕着翻译实践展开的一些经验体会,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可言。但是随着翻译学这门学科在最近几十年来的日臻成熟,当今的翻译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跳出原先局限于语言文字转换框架内的“术”的层面,而越来越多地上升到关于翻译的思想和原则的“学”的层面。这样的翻译研究成果往往能够改变人们对某种既定的翻译行为、标准、方法等的看法,导致一种新的翻译实践模式的诞生。不难想见,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翻译必将继续占据人类知识领域的重要位置,并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因此,传统的居于对比语言学之下的翻译的定义应当根据翻译的最新发展进行修正和完善,翻译的内涵应该进一步扩大,要把翻译从纯粹字面意义的转述定义为文化层面上翻译、阐释和交际。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学者的翻译研究成果,如谢天振的《译介学》^①、《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②,王宁的《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③、《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④,许钧的《翻译论》^⑤等著述所作的研究,正好契合了当今国际译学的最新发展趋向,并站在中国学者的独特立场,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

再次,体现在对翻译史研究和翻译批评研究的高度重视上。在此之前,中国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史著作,对翻译史的研究同样少之又少。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在翻译文学史、翻译史的编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迄今为止,翻译史类的著述已经超过30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对翻译史的研究也取得

①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2013年译林出版社推出该书的增订本。

② 谢天振:《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③ 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年。

④ 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 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了长足的进展,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①、《翻译与文学之间》^②,廖七一的《胡适诗歌翻译研究》^③、《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④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与此同时,作为翻译学学科三大支柱之一的翻译批评同样得到了高度重视,许钧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⑤较早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最后,中国学者也没有遗忘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视角,他们同样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如黄国文的《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⑥和王东风的《连贯与翻译》^⑦等著述。

然而,尽管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在翻译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的一些学者还在国际翻译研究或文学和文化研究刊物上主持过介绍中国翻译研究的专号^⑧,但是总的说来,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译学研究成果并不是很了解。而由于传播的局限,甚至国内读者对于哪些学者和哪些著述能够代表中国翻译研究的前沿也不是很清楚。为此,我们决定编选一套翻译研究丛书“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集中展示中国当代翻译研究学者的代表性论著。我们将先推出“文库”的中文版,

①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② 王宏志:《翻译与文学之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 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④ 廖七一:《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⑤ 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译林出版社,1992年。

⑥ 黄国文:《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⑦ 王东风:《连贯与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

⑧ 如王宁为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Neohelicon, Amerasia Jour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等十多家国际英文期刊主编了翻译研究与文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辑,许钧与王克非也为 *META* 主持过“中国翻译实践与理论”的专号,等等。这些专辑不仅发表了数十位中国学者研究翻译的论文,同时也加快了中国人文学科国际化的步伐。

然后推出它的英文版,在国外著名出版社出版。入选本“文库”的作者应该是能够代表当代中国翻译研究的前沿,其著述不仅在国内译学界处于领先地位,其中的一些论述也已经或者有可能引起国际学界关注,进而通过将来英文版在国际权威出版社的出版,使得中国的翻译研究进一步得到国际学界的了解和承认。在甄选“文库”的入选人选时,我们也有意考虑有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外语语种的作者,尽量使入选的作者更具代表性。首批入选的六位作者既有比较文学学科背景,也有语言学背景;既有外国文学背景,还有中国文学背景。在外语语种方面,除英语外,还有俄语和法语背景的学者。入选的论文集原则上由作者本人从他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精选出 15—20 篇的代表性论文,按内容编成三至四个部分,每本书的总字数控制在 20 万字左右。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第一辑入选的六位作者的论文集标题分别是:谢天振的《超越文本 超越翻译》,王宁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许钧的《从翻译出发:翻译和翻译研究》,王宏志的《翻译与近代中国》,廖七一的《翻译研究:从文本、语境到文化建构》,王东风的《跨学科的翻译研究》。在条件成熟时,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第二辑和第三辑。我们希望通过本“文库”的编选和出版(包括在国外权威出版社出版),不仅能为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作出贡献,同时还能把能够代表中国译学研究前沿的专家学者及其代表性著述带入国际翻译研究界,让世界更直接、更快捷地了解中国的学术,让中国翻译界的学术研究切实有效地走出国门。

谢天振 王 宁

2014 年 2 月于上海

前 言

从大学毕业至今,已经近四十年了。回想这近四十年走过的路、所做的事,我自己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翻译。我曾不只一次地说过,我做的事基本上只与翻译有关。我做翻译,包括口译与笔译,口译做过同声传译,也做过学术翻译、陪同翻译,有机会认识了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著名哲学家德里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等先生,有的还成了很好的朋友。笔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也译过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在做翻译的基础上,我对翻译进行思考,进行研究。除了做翻译,研究翻译,我的主要工作是教翻译,培养做翻译、研究翻译的人才。这几十年来,我之所以坚持不懈地做翻译、研究翻译和教翻译,是因为我对翻译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因为我们都知道不同语言文化的交流离不开翻译,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翻译,世界的和平也离不开翻译。

我从翻译出发,通过翻译与翻译研究,把目光投向了人类悠久的翻译历史,在历史的审视中,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作用、翻译主体的活动、翻译研究的发展和翻译学科的建设进行思考。本书记录的就是我在翻译与翻译研究的道路上对翻译的思考与探索的印迹。

翻译活动是丰富的,有多种形态。雅各布森将翻译活动分为三种类型:符际翻译、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符际翻译和语际翻译,我们译学界有过不少研究,但对语内翻译,似乎关注不多。我在《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一文中曾谈道:“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不能没有传统,而不

同时代对传统的阐释与理解,会赋予传统新的意义与内涵。想一想不同时代对《四书》、《五经》的不断‘翻译’,不断阐释,我们便可理解,语内翻译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丰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一种保证。”

翻译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在我看来,翻译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对于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我们现在了解得比较多了。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来看,翻译能够克服语言差异造成的阻碍,达成双方的相互理解,为交流和对话打开通道。正是借助翻译,人类社会才从相互阻隔走向了相互交往,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狭隘走向了开阔。从某个具体国家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来看,翻译通过对别国先进科技和文化的介绍,能够引进知识,开启民智,塑造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在特殊时期甚至能对社会重大政治运动和变革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

而翻译的语言价值观,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认识翻译活动对语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问题。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写作活动,又与写作活动不同,两种语言的交锋很容易创生“第三种语言”,进入译者母语后,能够从句法、词汇等方面丰富并拓展后者。梁启超曾讨论过佛经翻译文学对汉语的直接影响,据他介绍,当时日本人编了一部《佛教大辞典》,其中收录“三万五千余语”,暂不论这“三万五千语”是否完全进入汉语系统,可以肯定的是,创造新词的过程是汉语逐渐丰富的过程。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新词汇也意味着新观念,语言上的变化也会对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造成影响,如是观之,我们会明白为何“五四”运动前后,几乎所有进步报刊都登载了翻译作品,而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等人又为何会如此热衷于翻译了。

关于翻译的创造性,学界关注不够。翻译本身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只有凭借译者的创造才能实现。而且当我们讨论翻译的社会、文化和语言价值时,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翻译在这些层面所表现

出的创造力。而当“本我”意欲打破封闭的自我世界,向“他者”开放,寻求交流,拓展思想疆界时,自我向他者的敞开,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求新求异的创造精神。与此同时,翻译中导入的任何“异质”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语文化的因子,具有创新作用。

在当今的时代,我特别关注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翻译应该承担的使命。在我看来,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一方面给翻译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也赋予了翻译更为重要的使命。2002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曾访问南京大学。当他得知我多年来一直从事翻译实践与研究后,充分肯定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还为我正在撰写的《翻译论》题写了一句话:“翻译有助于发展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则有助于加强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我认为这句话很好地定义了翻译在全球化时代的使命。全球化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加利访问南京大学时,曾做了《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重要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世界化进程会对文化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危及文化多样性。他的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某些国家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经济利益为诱饵,在推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谋求强势文化的地位,甚至表现出十足的“文化霸权主义”,例如“英语”的日益国际化看似为交流提供了某种便利,实际上却削弱了或正在削弱一些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语言文化。面对这种现状,不难理解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对“文化多样性”的维护,而翻译因其本质属性,能够而且必须在维护“文化多样性”过程中承担重要使命。

那么,翻译要怎么做,才能承担起维护文化多样性、加强世界和平建设的使命呢?在本书中,我特别强调要从跨文化交流的高度去认识翻译。有几点特别重要:一是在理解翻译的本质时,要坚持将翻译视作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它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作为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转渡人”,译者对“文化多样性”及其重要性的体认应该更为深刻,也因此承担了更为重大的责

任。只有正确认识翻译,充分看到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译者才有可能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对文化因素更为敏感,对保存和传达文化因素更为谨慎。二是在翻译中,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善待各种不同的语言。加利在南京大学所做的《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演讲中就曾指出,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多元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条件,而世界的民主与和平有赖于语言与文化的多元,因为在他看来,“一门语言,它所反映的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思维方式。说到底,它表达了一种世界观。如果我们听凭语言的单一化,那将导致一种新型的特权群体,即‘话语’的特权群体的出现!”翻译如要为维护语言多样性作出贡献,就要坚持开放与交流的文化心态。三是要发扬翻译精神,勇敢承担历史赋予翻译的使命。南京大学的程章灿教授在读了我的《翻译论》后,曾写过一篇富有真知灼见的读后感。在文章里,他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翻译的时代,而翻译的时代不可缺少的是翻译精神。他从我对翻译本质的定义出发,将翻译精神总结为“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五个方面。实际上,上面提到的尊重并再现语言、文化差异都是这翻译精神的体现。发扬这一翻译精神,实际上便是在准确定位翻译的同时,勇敢承担起语言、文学、文化、社会、历史等种种层面的使命,而加利所说的“发展文化多样性,加强世界和平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自然也被包括在了里面。

在对翻译进行思考与研究的同时,近三十年来,我和翻译教学与研究界的同行一起,一直致力于翻译学科的建设。在这方面,我们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在本书中,收有多篇文章,里面表达了我对翻译研究的一些看法,也有我对国内翻译研究所作的总体的评价,还有我对中国译学研究的贡献与发展的前景的思考。在中国翻译协会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我为《中国翻译》撰写了一篇长文——《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过去常有人说“翻译无理论”,现在翻译理论实实在在地存在了,不少人又说“理论无用”,这种对翻译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危害不小,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我们对翻译本质的形而上思考、对翻译过程的多层面研究以及对翻译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我本人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是有明确的理论追求的,而且我认为这非常重要。理论意识在译者选择原作、研究原作、确定翻译策略、解决具体问题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而翻译活动的经验总结、理论升华更能对今后自己和他人的翻译实践有所启迪和助益,避免实践的盲目性。

事实上,从最朴素的翻译思考到今天多视角、多方法的科学理论,翻译研究在不断加深人们对翻译本身的理解,深化了人们对翻译复杂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如果没有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翻译活动可能还囿于经验主义的层面。如果没有翻译的文化研究,我们可能还无法对制约翻译产生与接受的机制具有如此全面自觉的意识。而对翻译理解的深化也促使人们从社会交流、文化传承、语言沟通、创造精神和历史发展等多元角度来看待翻译的价值,对翻译的重要性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有利于在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方面进一步凸显翻译的重要性。

在我看来,翻译研究也为翻译学科建设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蓬勃发展的过程,也是翻译学科在中国确立的过程,没有翻译研究的坚持不懈和不断深入推进,翻译学科的建设便会是一句空话。翻译研究还为我们理解和探索人类交流的历史开辟了一条新路。翻译是人类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翻译活动集中体现了跨文化交流中可能出现的障碍和冲突,也能通过本领域的经验为其他形式的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达成提供借鉴,而无论是对障碍的分析还是对经验的提炼都需要借助于理论研究。

基于此,我觉得翻译研究应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翻译研究要注重本体性回归。我所强调的回归,是一种方向性的,也就是我们应该重视探讨并明确翻译研究的对象。没有专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的存在。在明确了

研究对象之后,继续深入对翻译活动本质属性的研究和认识。我曾提出翻译活动的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我觉得还可以往这些方面做些更为深入的探索。二是理论创新很困难但也存在可能性。近些年来,翻译研究界在研究方法上似乎的确遭遇了发展瓶颈。瓶颈怎么突破?我认为要处理好几层关系:首先是处理好理论引进与本土化的关系。在引进西方理论的同时也要考虑是否适合我国国情的问題。其次是要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我们国家有悠久的翻译思考的传统,这些传统译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应立足当下,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再发掘与再阐释,赋予其在新时代的新内涵。最后还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对以往的理论的思考、批评与探索中发现新的价值,并予以继承与发展。处理好这三个层次的关系,对翻译研究来说至关重要;而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这本身就构成了很好的研究课题。三是要重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与其他学科形成积极互动。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有学者认识到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我们在坚持翻译研究的中心地位的同时,可以向其他学科借思想借方法,加强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对话。当然,正如我不断重申的那样,借用别人的方法,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领域的问题,加深我们对自身研究对象的认识,而不是用翻译现象去佐证其他学科的观点。四是要关注重大社会问题。研究者也是有使命的,那就是以自己的工作为国家、社会、民族发展作出贡献。例如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学术界对“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问题非常关注,我认为翻译学界大有用武之地。我们注意到,国家将“文化走出去工程”作为一个国策来谋划,这为我们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翻译研究界责无旁贷,要以我们实实在在的努力,作出应有的贡献。只有这样,翻译研究才有可能焕发新机,与时代同行,逐渐增强我们研究的社会影响力。

——2014年1月15日于南京大学树华楼

目 录

前言	1
----	---

上编 翻译面面观

翻译层次论	3
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	16
论翻译之选择	30
试论译作与原作的关系	44

中编 翻译文化与翻译主体论

文化差异与翻译	61
翻译研究与翻译文化观	73
“异”与“同”辨	
——翻译的文化观照	88
翻译动机、翻译观念与翻译活动	100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	112
简论理解和阐释的空间与限度	128